

 世界宗教研究丛书
卓新平◎主编

宗教与 当代中国社会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论坛
(2011·宗教学)

卓新平
——
主编

· 014005351

B911-53
01



世界宗教研究丛书

卓新平◎主编

曹中建 金 泽◎副主编

宗教与 当代中国社会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论坛
(2011·宗教学)



卓新平

主编

B911-53
01



北航

C169330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宗教与当代中国社会 / 卓新平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11

(世界宗教研究丛书)

ISBN 978-7-5097-5182-4

I. ①宗… II. ①卓… III. ①宗教文化-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B92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46014 号

·世界宗教研究丛书·
宗教与当代中国社会
——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11·宗教学)

主 编 / 卓新平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责任编辑 / 王玉霞

电子信箱 / renwen@ssap.cn

责任校对 / 谢 敏 秦 晶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范 迎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印 一 张 / 23.25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 387 千字

版 次 /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5182-4

定 价 / 7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北航

C1693308

总 序

世界宗教在我们所经历的世纪之交、千纪之交空前活跃，并在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如何去认识、研究和理解世界宗教，这是我们在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在中国当代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氛围中，人们已体会到宗教的普遍存在，并开始关注宗教问题，关心宗教研究，将宗教的作用及影响与现实社会的生存及发展密切关联。不过，在对宗教的认知和理解上，人们的见解和观点显然仍存有分歧，这给我们争取达到宗教审视之共识带来了种种困难，却也提醒并促使我们多层面、多角度地认识世界宗教的存在，观察其演变发展。

在对各种世界宗教的复杂体认中，大致有如下两种视角：

一是把宗教作为人类精神及社会生活的“常态”来看待，从世界宗教中体悟出人的社会性、人本性、文明性和超越性。对此，宗教研究者有诸多表述，反映出其对宗教所关涉的主体或客体、集体或个体、内心或外在的不同侧重。例如，奥托认为宗教是“与神圣的交往”，在此突出人对“神圣”或“神圣者”的信仰。缪勒也指出宗教是人“领悟无限的主观才能”，即人的内心的本能、气质、人寻求超越的渴望。斯特伦把宗教理解为“使个人和社会经历一种终极的和动态的转变过程”，其所言“终极转变”即从深陷于一般存在的困扰而彻底转变为体验到一种“最可信的和最深刻的终极实体”，由此在这种“构成生命的终极源泉”中确立自己的存在，使自己的精神变得充实和圆满。斯塔克则认为宗教是人之本性寻求补偿的体现，因而要追求一种具有超越性的信仰生活。宗德迈耶尔对此曾强调“宗教是人类对于超越经验的共同回答”。蒂利希则突出宗教是“人的终极关怀”，希望从这种关怀中体现出人的精神活动及其本真意义。总结

这些宗教理解，伊利亚德以宗教是一种“人类学常数”来说明宗教与人的密不可分，认为“人”就是具有宗教情结的人格存在，人的本质特性与宗教本质特性有着内在关联，人性乃宗教存在的本体性前提，有人就有宗教。宗教作为这种人性的“普遍性”还被柏格森所坚持，他宣称在从古到今的人类社会中，或许在某一时段、某一地域有可能找不到科学、艺术或哲学，但绝不会找不到宗教。

在上述对宗教的“常态”认知中，一般会把宗教的表现形式理解为作为“内在形式”的“宗教性”和作为“外化形式”的“宗教建构”，在宗教的功能形式上则将其理解为“超越性”形式和“安慰性”形式。比较存在形态的“宗教性”与“宗教建构”，我们会发现其“宗教性”以信仰内在的形式而给人“虚玄”之感，相关内容多涉及人的思想、精神、意念、情感；其外化形态的“宗教建构”则以其“实在”和“具体”性而反映出人类社会关系的构建，并以各宗教的社会、民族外观来代表与之相应的客体文化形态；在此，蒂利希认为宗教是文化的实质，文化是宗教的表现形式，其相互呼应则可展示文化的表层繁复与宗教的深层蕴涵之有机共构。但在宗教与文化的关系理解上亦可换位，即把宗教看作人类的精神、文化形式，是其“象征化”或“符号化”。论及这种宗教与文明的关系，道森认为“伟大的宗教是伟大的文明赖以建立的基础”，“宗教是界定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这样，宗教不离人类的文化构建及文明发展，并成为许多文化体系中的核心价值观和许多民族社团的精神家园。而在对宗教功能形式的认知上，一方面可看到宗教“超越性”形态的“终极性”旨归和对人类“自我升华”的憧憬，另一方面则可从其“安慰性”形态上体悟到宗教补偿功能所表现出的一种理想化的对“现实的幻想”，以及由此折射出的“社会的倒影”。它旨在使“此岸的缺陷”为“彼岸的充盈”所弥补，以宗教的慰藉来应对今生今世所遇到的一切，从而达到人们精神上的解脱。对此，恩格斯曾总结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恩格斯从这种对宗教的“常态”理解中，进而指明宗教性乃“包含有人类本质的永恒规定性”。

二是从“问题意识”的视角来看待宗教，即认为宗教的出现乃是人的存在或意识“出了问题”，宗教作为社会反映即为社会的“问题”反映。

如果基于这种对“问题”的评价，那么宗教的存在就不一定是社会的“常态”，甚至可能会被理解为一种“不正常”的状况。其实，在此所论及的“社会常态”乃一种被“理想化”、被人为拔高了的“常态”，或者在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充其量也只是个别的、短暂的存在。从问题意识来理解宗教，则会关注人们反映这种问题的社会表层和心理内层，以及二者的复杂交织。在对个人心理内在的分析上，弗洛伊德创立了其深蕴心理学，并将其探究与宗教认知相关联。在他看来，宗教乃说明人的意识、人的心理状况出了问题，宗教实际上是表现出人的“有限性”、“依赖感”、精神压力和负担；而且，原初的宗教之诞生，就已反映出人与其“父母情结”相关联的“负罪感”，故此亦折射出人的心理问题。宗教所揭示的社会问题，则在马克思的经典表述中清晰可见。马克思曾深刻指出，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而且还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之所以被马克思视为“人民的鸦片”，就在于宗教表现出“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无情世界的感情”、“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因此，马克思的问题意识实质上是其对宗教的同情和对产生出宗教的“问题”社会之揭露和批判。

当然，今天如果仍然从“找问题”的角度来看待并理解宗教，那么认识者本身至少会在潜意识上对“宗教”的存在及发展是持有怀疑或批评的看法的，即认为宗教反映出了一种“有问题”的社会存在，而且它并非社会主流所肯定、承认或希望的现象。显然，上述两种视角会带来对宗教“价值”、“意义”的不同观点，而且各自在对宗教的社会定位之审视和判断上也势必会有不同。尽管在今天看来单纯从“问题意识”上评说宗教已经暴露出了其不足和缺陷，这两种视角的宗教认知应该说却都是有其意义和必要性的。这些不同的视角能促使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并综合性地看待宗教。当然，以平常心来看待作为人类社会“常态”的宗教是在一般性、普遍性意义上所言的，而发现、审视宗教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则应基于其特殊性，以及其时空关联性。

其实，宗教在“使人类的生活和行为神圣化”的过程中，会在人的精神上实施其最强有力的社会指导及控制。其积极方面会引导人们朝向崇高、达到升华、超越自我，而其消极方面也可能让人陷入偏执、狂热或痴迷。为此，贝格尔认为“宗教在历史上既表现为维系世界的力量，又表现

为动摇世界的力量”，因而有必要从其利、弊，正、负等双向功能上来看待宗教的社会作用。但我们对之仍需有主流性、总体性的把握。在精神文化意义上，对宗教核心价值观的认识和挖掘，既可对宗教得以存在的社会获得更为深刻的体认，又能积极引导宗教适应并促进与之相关的社会发展。正如道森所言，“宗教是历史的钥匙，不理解宗教，我们就无法了解一个社会的内在形态”；而在宗教与社会的关系中，“若把某种文化看作一个整体，我们就会发现，抑或有悖于人类社会的价值与规范的宗教，如果引导得体，也会对文化产生能动作用，并为社会变革运动提供动力”。由此而论，宗教对于人类社会存在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和非常复杂的功能。我们认识和研究宗教，应该持有“客观认识”、“积极引导”的态度。

为了对世界宗教有客观、真实、全面、深入的理解和研究，我们组织了《世界宗教研究丛书》，以基于上述考量来在宗教探讨上求真求实。在此，我们在面对世界宗教时，既会对之持有体认人类社会文化现象的“常态”，也会有我们自己在研究上的“问题意识”。编辑、出版这套丛书，我们并不着眼于在研究世界宗教之范围上的系统、整全，而是重在其个案研究，具体分析，触及相关的人或事，以便能从点滴积累开始来面向世界宗教的浩瀚大海，纳百川之细流而汇入其汪洋博大。因此，我们希望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积少成多、渐成规模，以一种实在性、持久性来探究源远流长、丰富多彩、错综复杂的世界各种宗教现象。“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我们将锲而不舍，始终保持这种研究的开放性和开拓性。

卓新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2009年7月1日

序

卓新平

2011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11·宗教学）在北京湖南大厦成功召开。这次国际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世界宗教研究所承办，并由加拿大维真学院、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香港浸会大学中华基督宗教研究中心和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等学术机构联合协办。与会代表不仅有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的同行专家，也有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芬兰、荷兰等国家和地区的知名学者，大家共同就“宗教与当代中国社会”等议题展开了学术研讨。

宗教在“全球化”时代的发展，是当代中国宗教发展的国际背景，其影响既触及中国各种宗教，同样也波及中国当代社会。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真正做到了与国际接轨，实现了与当今世界的同步发展。中国社会的转型及其发展上的巨变，有着极为独特的意义，也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因此，对当代中国社会的研究，涉及其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各个方面，而对信仰问题的探讨则更是成为热点。中国社会有着其历史传承，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传统给当今中国文化的基本定位打好了底色。显然，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不可能凭空而起，其文化积淀之厚重为其今天的腾飞奠定了必要基础。所以，我们研究当代中国社会，不可回避或忽略对其历史的回溯、反思。此即我们所言的文化自知和文化自觉，是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和民族精神，这也是我们文化自信的重要来源。不过，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已不可能孤立地发展，必须超越、扬弃以往“内涵式”“封闭式”的保守模式，而应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国文化气质来放眼全世界，为中国当今发展寻找新的资源和动力，由此获得我们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和全新面貌。从这一意义来看，中国社会结构、社区布局、社团群体、社会阶层及社会意识已与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更为复杂、更加多元，而且有了非常明显的开放性和互渗性。而我们要想真正认识这一开放社

宗教与当代中国社会

——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11·宗教学）

会，也需要更加开阔的视域、更为深邃的目光。社会发展的多元化，社会人群的多元化，社会认知的多元化，这是我们时代的一大特点。为此，社会研讨就必须集思广益、博采众长，这样才能找到真理、达成共识。

宗教在现代社会同样出现了新的变化和发展。不同宗教都有其历史传承，由此呈现出其信仰特色。但是，这些传统宗教在现代社会中也展示出其新的面貌，反映出与相应社会的适应，以及在其中的自我更新。这样，研究宗教也需要历史视域与现实眼光的叠合，不能以古旧的观念来审视今日的宗教，同样也不能忽视其历史发展的曲折进程及由此产生的复杂变化。我们应该多层次地看待宗教，对之做出客观、理性的分析，并结合其相应的社会存在来对其加以真实、准确地评价。对不同社会、不同时代中存在的宗教，我们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应该看到，宗教存在是人类大多数社会存在的一种常态，而且其存在方式乃历史悠久，人们对之也早已习惯。所以，千万不能视人类社会的宗教历史存在为另类，在今天更没有必要对现实社会中的宗教大惊小怪、不知所措。承认宗教的社会存在，找出其在社会中的基本特点，这才是我们在审视社会中的宗教时理应持守的基本态度。对宗教认知的简单化，反而会导致人们对其评价的复杂化。在我们今天的中国社会，一定要走出这种对宗教在认识上的误区。如果我们把宗教弄得过于敏感，那么我们的社会也就会充满张力甚至产生潜在的危机。如果宗教在我们的社会中有问题或频频出问题，那么我们就应该反思我们的社会，解决好社会矛盾，理顺社会中的各种关系。为此，我们要促进宗教在社会存在中发挥其“使人类的生活和行为神圣化”的本真作用，给社会增加正能量、让其在社会发展中对人们有着积极影响。对宗教的积极之态和积极引导，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我们对之不要小看或忽视。在这一方面，我们就有必要比较、研究各个社会对宗教问题的看法和处理，借鉴其成功经验，吸取其历史教训。探究宗教与社会的关系，就是为了推动美丽中国、和谐世界的发展。

这次我们论坛的议题涉及面较广，有着开阔视野、启迪智思的意义。大家讨论了宏观层面的宗教及信仰理解，包括宗教与社会信仰、社会意识、社会建构、社会变迁、社会政治、社会文化、社会教育、社会慈善、社会救济等方面，使我们对宗教与社会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更全面的把握。这种探究还关注到社会结构变化、历史发展转型、城乡及人口问题凸显等对宗

教在当代社会中的存在及发展之影响，以及宗教与社会的双向互动、中外宗教对终极价值的理解等。当然，宗教之间的关系，如宗教的复杂相遇、宗教间的相互对话、宗教多元中的和谐，以及宗教在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等，也是学者们讨论得较多的话题。在此，大家特别强调了宗教在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参与和作用，认为宗教通过自身的文化创新可以有力推动现代新型社会关系的构建。当然，在正面肯定、积极评价宗教在社会发展中的意义和作用时，大家也意识到应对宗教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因其传统中的保守因素而可能产生的消极、负面作用加以防范和避免，即要发挥宗教在社会发展中的正功能、正能量，尽量消除或减少其负功能、负能量。此外，本次论坛在微观或具体层面还专门讨论了基督教与现代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大家尤其注意的就是基督教与中国主流文化、与中国当代社会的关系问题。对此，大家论及的话题包括基督教神学与中国多元的宗教理论之互动，基督教的灵性追求与其社会实践之关系，基督教与国际政治和中美关系，基督教在中国社会实践中的参与方式和不同影响，基督教经典对社会正义问题及和谐平等发展的启迪等。中国学者还特别关注到社会层面的基督教“中国化”问题，以及理论层面的“汉语神学”与当代中国学术发展的关系。这里涌现的问题意识和呈现的开放态度，为我们今后更深入、广泛的研究埋下了伏笔、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宗教学领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这种论坛还是第一次。我们可以非常自豪地说，这次论坛取得了圆满成功，并为今后组织这样的论坛积累了经验、创造了条件。这里，要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及各部门对本次论坛的大力支持，特别感谢海内外各协办单位的积极奉献，更要感谢来自世界各国和中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的热情参与！现在，我们将本次论坛的论文汇编出版，既是对我们已有研究成果的总结，也是对今后我们研究发展的前瞻。

2013年6月28日

目 录

序	卓新平 / 1
“基督教中国化”三思	张志刚 / 1
以小说塑造民族之魂：梁启超的应用佛学	郁 丹 / 11
巴哈伊教独特的宗教观	蔡德贵 / 22
作为“社会权力”的宗教及其信仰	
——当代中国宗教信仰认同模式的转型	李向平 / 30
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到文化遗产：中国合法性道德基础的变迁	赵文词 / 39
宗教与教育：比较研究的视野	范·彼得 / 53
“宗教法人”设立刍议	刘 澎 / 62
城市化对中国基督教的影响	段 琦 / 71
不同宗教之间一定要排斥，不可以和谐吗	
——从跨文化宗教艺术到修养的融合	温伟耀 / 80
宗教间对话促进跨文化交流	罗明嘉 / 82
中国宗教需要多元论的宗教理论吗	王志成 / 94
宗教对话在中国的发展前景：来自亚洲邻国的经验教训	魏明德 / 107
灾难现场的宗教应对体系	郑筱筠 / 121

宗教与当代中国社会

——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11·宗教学）

- 和谐宗教 从经开始 游 斌 / 132
- 社会模型：信仰、形式与政治的想象力 克里斯托弗·汉考克 / 136
- 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魏道儒 / 148
- 中国宗教应为中华文化建设出大力 王晓朝 / 153
- 宗教文化创新与建构新型社会关系 何其敏 / 155
- 百年国学与西学中的宗教元素 黄保罗 / 159
- 文化身份的“动词性”逻辑
- 传教士的身份、认同及其游移 杨慧林 / 173
- 冷战宗教：冷战对中美宗教的影响 魏克利 / 177
- 后殖民时代基督宗教的全球发展态势 赵 林 / 192
- 宗教研究对人文教育的意义 赖品超 / 211
- 汉语神学与中国学术 杨熙楠 / 226
- 由文化神学发展为教会神学与灵修神学：一种对巴尔塔撒的
- 神学解读 郭鸿标 / 237
- 宗教与社会变迁：早期基督宗教渗透社会的策略
- 转化罗马政治术语为信仰概念 黄根春 / 258
- 行公义、好怜悯：基督教对当代香港社会的陶塑
- 以教会在东九龙的服务为例 刘义章 / 265
- 利玛窦研究的新进展 张西平 / 285
- 宗教的多维面向和内在张力 张庆熊 / 297
- 关于四川省泸州市基督教会开展医疗卫生服务的调研报告 ... 陈建明 / 309
- 清宫画家法国耶稣会修士王致诚在华活动考述 汤开建 / 325

“基督教中国化”三思

张志刚*

本文标题出自如下两个立意。其一，“基督教中国化”（Sinolization of Christianity）是相对于以往惯用的“本色化”（Indigenization）、“本土化”（Localization）或“处境化”（Contextualization）等词而言的，在笔者看来，这几个词主要属于“教会的概念”，即主要是“教会的学者”用来讨论基督教如何适应传入地的文化背景或社会处境的。譬如，怎么用中文来译注《圣经》，能否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或思想解释教义，如何适应中国社会状况布道传教等。本文所用的“中国化”概念，则定位于“学术的立场”，即力求更客观、更理性地探讨基督教何以能够融入中国文化、中华民族，特别是当代中国社会。其二，“三思”一词取自中国成语“三思而行”，笔者以为，这个成语所蕴含的素朴哲理也适用于我们思考“基督教应否融入中国文化、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当然，这样一个重要且复杂的课题，绝非笔者个人所能完成的，而是要靠海内外同行——关心中国基督教的各方学者集思广益，百家争鸣，共同探索。正是基于上述初衷，笔者将近些年来的研究体会梳理为“本文的三思”，以期抛砖引玉，征得批评指正，裨益日后研讨。

一 “洋教身份”：中韩基督教史比较引发的思考

如果用比较的眼光考察中韩两国的基督教传入史，并思考基督教在中韩两国近代史上所起的主要社会作用，即对各自的民族和国家所起的主要社会作用，我们可以发现，二者存在着强烈的反差。这种反差有多么强烈呢？下述历史反思可使我们一目了然。

* 张志刚，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前主席罗冠宗先生指出：

近代基督教是在19世纪传入中国的，它对中国的社会曾经有过一定的贡献；不幸的是，基督教的传入又是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分不开的，而且被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所利用。

早在1922年的非基督教运动中，首先是教外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同时，尖锐地抨击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先锋队。而后在同年5月举行的、由外国差会控制的“基督教全国会议”中，中国基督教代表也批评指出：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国耻有相关的联系，西方自称“基督教国家”，却违反教义，侵略欺凌我国，致使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受到很大阻碍；他们还批评当时在差会“管教”下的教会其实仍是一个“外国教会”，所以受到外界的非难。在1925年五卅运动中，在全国人民愤怒声讨帝国主义枪杀我国同胞的同时，爱国的基督教也纷纷抨击那些“基督教国家”贩卖鸦片，发动侵略战争，强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恶贯满盈；而有的传教士却违背教义，口是心非，包庇其政府的侵略罪行。这些，都是历史上教内外爱国同胞抨击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罪行的史实。^①

关于中国基督教史的分期，徐如雷教授曾这样概括道：

中国的基督教可以1949年新中国建立为界分成两个历史时期。

1949年前，基督教是舶来品，有130多个宗派在中国进行传教活动。所谓中国基督教只是外国传教地图上的一个点。1907年外国传教士在上海举行在华传教百周年大会，会上曾就“中国教会”这个称呼进行过议论和表决，表决结果是只能用“Churches in China”（教会在中国），不能用“Chinese Church”（中国教会），虽然这两个英文词都可译成“中国教会”。事实也的确如此，当时并没有真正的中国教会，或中国的基督教，有的只是

^① 以上两段引文参见罗冠宗主编《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史实述评》，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前言，第2、4页。

外国“教会在中国”，中国只是外国教会的传教区。^①

正因为 1949 年前基督教长期未能摆脱“洋教身份”，中国教会才把三自爱国运动视为其当代史的标志性事件。

20 世纪中国基督教最重大的事件，就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发起的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以下简称三自运动）。三自运动的最大功绩就是使基督教割断了同帝国主义的关系，摆脱了外国差会的控制，使一个被帝国主义侵略利用的“洋教”，改变成为中国基督教独立自主自办的、自治自养的基督教，从而使基督教开始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开辟了在社会主义祖国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和推进神学思想建设的道路。^②

与 1949 年前基督教在中国难以摆脱的“洋教身份”形成鲜明对照，我们在关于韩国基督教史的学术著作里读到的是这样一些论断：

“三·一”民族独立运动展示了韩国基督徒反抗压迫，追求民族独立与进步的风采，也推动了韩国传教事业的发展。由此可知，信仰基督教具有近代民族主义的色彩，并在这样的特殊历史环境下，基督教逐渐成为能够救民救国的民族宗教，人们再也不把基督教看成“西方宗教”了。

韩国民族运动的思想基础在于基督教神学的自由民权思想。换句话说，韩国的民族运动与基督教是分不开的。面对民族危机，韩国基督教在不同的时期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基督徒积极地站在争取民族解放、反日爱国斗争的前列。

韩国《独立宣言》宣布当天，33 名签名者中就有 15 名基督徒。

因此，在韩国民族独立运动中，基督教领袖被民众尊奉为民族英雄。^③

笔者要认真说明，首先引用上述文献观点，绝无任何贬低中国基督教，抬高韩国基督教的意思。其次，尽管以上引文所表述的两种历史判断肯定难以反映近代中韩基督教史的全貌，也难免含有这样或那样的情感色彩或理智

① 徐如雷：《中国基督教的神学研究》，载朱维铮主编《基督教与近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 126～127 页。

② 罗冠宗主编《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史实述评》，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前言”，第 2 页。

③ 申奇勇：《韩国基督教的民族主义：1885-1945》（韩文版），东革出版社，1995，第 37 页。See Shin Ki Young, *Christianity and Nation-Building in Korea: 1885 - 1945*, Phoenix: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1993, pp. 9 - 26.

倾向,但只要它们没有违背基本的史实,二者形成的强烈反差便足以使我们感悟出这样一个值得思考的历史社会学问题:中韩两国有着近亲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在近代社会史上也有着相似的历史境遇,可是,为什么同一种外来宗教——基督教却在两国扮演了相反的社会角色,造成了相反的社会印象,以至于得到了截然相反的历史评价呢?究其原因,不同背景的研究者自然会做出不同的回答。在笔者看来,主要的原因恐怕不在于基督教的经典、教义和神学本身,而在于传教士和本土信徒的社会实践效果,即对于它所传入的民族或国家的生存发展,主要是起到了正面的、积极的社会历史作用,还是负面的、消极的社会历史影响。

上述理由一旦说出来似乎浅显而简单,可它却能引发我们思考许多理论问题。比如,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对于一种“外来宗教”的接受或认可主要取决于什么呢?又如,所谓外来宗教的“本色化”“本土化”或“处境化”,其主要标志或衡量标准到底何在呢?再如,任何一种宗教传统,无论本土的还是外来的,其主要的功能和目的究竟何在呢?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转入下一部分讨论,这就是基督教自改革开放以来的迅速发展,在中国学界和政界所引起的“现实忧虑”。

二 “一教独大”:中国当代宗教生态引发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宗教政策的黄金时期”。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逐步落实,各大传统宗教,像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等,都恢复了活动,信众人数也都有明显的增长,但其中要数基督教的“迅速发展”^①最引人注目了。据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

① 不少学者认为,基督教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间发展得很快,并非“正常现象”,故有“蓬勃发展”“迅猛发展”“过度快速发展”“爆炸性增长”“扩张式发展”等提法。关于这些提法,可参见下列文献:梁家麟:《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村教会》(香港建道神学院,1999),李向平:《宗教信仰的国家想象力——兼评“宗教生态论”思潮》(《中国民族报·宗教周刊》,2010年7月27日);吕大吉:《关于继承和重构传统的民族宗教文化的一些思考》,牟钟鉴:《基督教与中国宗教文化生态问题的思考》,马虎城:《基督教在当今中国大陆快速发展的原因辨析——由“宗教生态失衡”论引发的思考》,段琦:《宗教生态失衡与中国基督教的发展》(以上4篇论文均载于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民族宗教理论甘肃研究基地秘书处编《当代中国民族宗教问题研究》,甘肃民族出版社,2009)。为保持描述上的客观性,笔者采用“迅速发展”一词。

界宗教研究所发布的调查统计结果，中国大陆现有的基督徒人数约为 2305 万。

为什么基督教能在中国大陆发展得这么快呢？基督教的迅速发展将对整个中国宗教状况产生什么影响呢？这是中国宗教学界十分关注的一个话题。近两三年来，关于“中国宗教文化生态问题”的研讨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观点。笔者以为，抱着客观的态度探讨这些观点，想必不失为国内外学术同行的共同兴趣。

在“2008 民族宗教问题高层论坛——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宗教”上，中国基督教史专家段琦教授发表了一场反响强烈的演讲，题为“宗教生态失衡是当今中国基督教发展快的主要原因”^①。她根据实地调研资料指出，所谓的“宗教生态”就是指各种宗教的社会存在状况，类似自然界的生态，其正常状态应该是彼此制约而达到总体平衡，即各类宗教各得其所，各有市场，从而满足不同人群的信仰需要；但如果人为地进行不适当的干预，就会破坏它们的平衡，造成有的宗教迅速发展，有的宗教则凋零了。基督教之所以在我国改革开放后得以迅速发展，就与宗教生态失衡有关。^②

段琦教授的上述看法得到了许多专家学者的认同。例如，中国宗教史专家牟钟鉴教授认为，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基督教之所以迅猛发展，主要有如下四点原因。（1）历次“左”倾的思想政治批判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反复扫荡了中国传统信仰的核心——儒学、佛教、道教，以及各种民间宗教信仰，而社会主义信仰又由于“十年浩劫”遭受重创，中国出现了信仰危机和信仰真空。改革开放使中国人的信仰需求得到释放，形成旺盛的宗教市场。在满足这种需求上，儒释道恢复元气较慢，而基督教却拥有强大的国际后盾，在条件一旦允许时便立刻重新进入中国，迅速填补了信仰的空白。（2）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人对西方文明偏于负面的看法，许多中国人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经济管理、物质文明的同时，也把基督教作为当代西方精神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加以吸收。这就使基督教在历史上作为帝国主义侵略工具的形象被淡化了，而作为“洋教”与现代西方文明联系起来。

① 这篇演讲稿收入此届论坛的论文集《当代中国民族宗教问题研究》时，标题改为“宗教生态失衡与中国基督教的发展”。

② 参见段琦《宗教生态失衡与中国基督教的发展》，载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民族宗教理论甘肃研究基地秘书处编《当代中国民族宗教问题研究》，甘肃民族出版社，2009，第 140 页。